



中国书籍文库 | China Books Library

汇集优秀原创学术论著
推动科研成果转化交流

公共选择理论探索

Exploration to Public choice theory

袁政 著



中国书籍出版社
China Book Press

公共选择理论探索

Explore to Public choice theory

袁 政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公共选择理论探索/袁政著. —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
2012. 9

ISBN 978 - 7 - 5068 - 3124 - 6

I. ①公… II. ①袁… III. ①公共选择(经济学)—理论研究
IV. ①F062. 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10284 号

责任编辑/ 李立云

责任印制/ 孙马飞 张智勇

封面设计/ 中联学林

出版发行/ 中国书籍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丰台区三路居路 97 号(邮编:100073)

电 话: (010)52257143(总编室) (010)52257153(发行部)

电子邮箱: chinabp@vip. sina. com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华东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 张/ 14. 5

字 数/ 261 千字

版 次/ 2013 年 1 月第 1 版 201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068 - 3124 - 6

定 价/ 42. 00 元

序

在公共管理领域从事学习研究的人们，对公共选择理论都不会陌生，其中许多人是积极关注的。即将付梓的《公共选择理论探索》可能会是一些同行专家、学者所乐于见到的一本有关新著。

我们可以简单回顾一下公共选择理论的研究，公共选择理论由布莱克（Duncan Black）、布坎南（James McGill Buchanan）和 G. 塔洛克（G. Tullock）、肯尼斯·阿罗（Kenneth Arrow）、奥尔森（Mancur Olson）等人创建。1950 年该理论的框架初步形成；1972 年肯尼斯·阿罗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1986 年，布坎南以其在公共选择理论方面的突出贡献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因对福利经济学的贡献于 1998 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所有这些标志着公共选择理论已经获得国际学术界的充分肯定。

公共选择理论是在不平坦的道路上走过来的，至今它仍处于“童年”时期。它的理论大厦仍存在许多需要人们去不断完善的地方。布坎南的传人罗杰·康格莱顿（Roger Congleton）2002 年在日本举行的“第 6 届国际公共选择研究大会”上的发言总结道：“和其他学科一样，在公共选择领域还有许多未解决的研究疑问。和别的科学一样，公共选择在这一方面还是漂浮在沼泽地上的。”

历时 600 余年（1248 ~ 1880）才完成的科隆大教堂以轻盈、雅

致著称于世。如果把公共选择理论的构建比喻为一座宏大建筑的建设，可以说60年的建筑时间还太短暂，从它的地基构筑到高大穹顶，到塔身、塔尖，再到装饰艺术，这一切都需要无数的、各种不同专业的能工巧匠历时多年的辛劳才能得以完工。可以说，公共选择理论大厦尚需要多种专业的“能工巧匠”齐心协力地去构筑它。

公共选择理论是一门位于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交叉领域的学科，对它的研究，需要召唤多学科的研究人员、或具有多学科背景的研究人员踊跃参与。

这是一门以严谨著称的学科，对它的大量问题的研究，都不同于“短、平、快”式的研究，它需要一个人长期、甚至终身投入其中。

这是一门需要争辩的学科，如同其他许多学科的成长过程一样，从不同视角展开争辩，是学科发展的重要推动力。

本书是袁政博士多年来对公共选择理论的部分研究成果，定名《公共选择理论探索》，名副其实。书中以协商、讨论、争辩的形式，参与到建设公共选择理论大厦的学术探索中。该书对公共选择理论研究的核心问题——社会福利函数的构建做了大量的、系统性的探索，沿着统计学的中心极限定理的路径，并对之有所改进，用于构造社会福利函数，论证了该改进创意在一定范畴内的合理性。著者认为该书的探索仍未画上句号，今后还需更上一层楼，从更广阔的视角探索社会福利函数问题。希望著者继续努力，取得新成就。

由于公共选择理论本身的严谨性、理论探讨过程的艰辛性，我国勇于参与到该理论领域去“探险”的学子应该得到学术界的理解与支持。

目 录

CONTENTS

第一章 公共选择理论研究概述	1
第一节 公共选择理论的起源	/ 1
第二节 公共选择的理论焦点	/ 4
第三节 我国学者的研究	/ 10
第四节 公共选择理论的新进展	/ 14
第二章 公共选择的未来前景(译文)	19
第一节 介绍:作为科学的公共选择	/ 19
第二节 公共选择的基础研究:展开革命的翅膀了吗?	/ 24
第三节 结论:在下一阶段还有很多事要做	/ 29
第四节 译者述评	/ 30
第三章 社会福利函数的条件分析	34
第一节 引言	/ 34
第二节 阿罗条件的解析	/ 37
第三节 无关备选对象独立性条件(阿罗条件 3)	/ 44
第四节 阿罗条件 3 与其他条件的冲突	/ 50

第四章 公共选择序关系信息平台探讨	71
第一节 表决的方法论争议——从基数论到序数论	/ 71
第二节 两两比较的序数表决	/ 75
第三节 两两比较序信息统计基数对普通基数涵义的超越	/ 84
第四节 公共选择序关系信息平台的补充讨论	/ 91
第五章 独立分散偏好的聚合	99
第一节 社会福利函数研究述要	/ 100
第二节 公共选择(投票)序关系信息平台	/ 104
第三节 聚合工具探讨——中心极限定理的启示	/ 105
第四节 借道李氏定理—— $W_0(x)$ 函数的构建	/ 112
第五节 对循环票现象的讨论	/ 120
第六节 关于通过阿罗条件(1、2、4、5)的证明	/ 124
第七节 满足不相关备选方案独立性(阿罗条件3)的证明	/ 127
第八节 小结	/ 129
第六章 运用实例	139
第一节 政府绩效评估权重设计中 AHP 法之改进	/ 139
第二节 S 海事局人力资源配置模型研究	/ 155
第三节 论我国和谐社会构建的基本路径 ——公共选择理论的运用分析	/ 182
第四节 信息化背景下城市公共决策模式变革思考 ——公共选择理论视角	/ 202

第一章 公共选择理论研究概述

【摘要】公共选择理论在激烈的争辩和曲折的背景中破土而出，是一种以现代经济学分析民主立宪制政府各种问题的学科。该学科在与一些传统学说抗辩中艰难地成长着，至今它的理论大厦仍未最后竣工，它的一些基础性的金砖玉瓦仍有待人们去熔炼。对公共选择理论的起源、曲折的发展历程、理论的争辩焦点、公共选择理论的新进展作评价、介绍、梳理，有助于我们较系统地认识该学科的发展状况。

第一节 公共选择理论的起源

一、公共选择问题溯古

早在 18 世纪，在科学思想浪潮的推动下，法国科学院的博尔达 (Borda, 1733 ~ 1799)、孔多塞 (Condorcet, 1743 ~ 1794) 和拉普拉斯 (Laplace, 1749 ~ 1827) 三位院士用各自独立地数学方法对政治学中的投票问题作了深入的研究，其中，博尔达计票法和孔多塞对投票悖论的分析最引人注目。可以说这些研究已经触摸到了现代公共选择研究的核心，但尚未形成公共选择理论的初始构架。

二、公共选择理论的孕育

公共选择研究理论的发育与福利经济学的发展有着特殊的联系。美国著名的公共选择理论大师丹尼斯·缪勒（Mueller, D. C）给公共选择理论下的定义常常被西方学者引用^①：“公共选择理论被定义为非市场决策的经济研究，或者可以简单地定义为把经济方法应用于政治科学。公共选择的方法仍然是经济学的方法。”而公共选择理论的经济学“基因”源自福利经济学。1890 年代至 1940 年代，福利经济学经历了空前的大论战，产生了新福利经济学和旧福利经济学的分化。

旧福利经济学以边沁、庇古等人为代表，其理论核心以边际效用基数论为基础，建立福利概念；新福利经济学主张效用序数论，认为边际效用不能衡量，个人间效用无法比较，不能用基数数词表示效用数值的大小，只能用序数数词表示效用水平的高低。

新福利经济学对序数论的提出，使 18 世纪建立于排序方法基础上的孔多塞悖论重新受到理论界的重视。新、旧福利经济学关于基数论与序数论的论战，成为公共选择理论的“育婴房”。

三、公共选择理论的逻辑起点^②

1948 年，邓肯·布莱克利用新福利经济学的分析框架，研究社

① [美] 丹尼斯·缪勒著：《公共选择》，王诚译，商务印书馆 1992 年版；[美] 丹尼斯·C. 缪勒著：《公共选择理论》，杨春学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9 年/1999 年版。

② 笔者注：奥地利经济学派的经济学家在 1920 年代及以后一段时期也进行了类似公共选择理论的研究（包括米塞斯和他的学生哈耶克等人），这样的研究模型先假设政客们是真心要造福人民的，然而却无法取得足够的经济信息（这个问题又被称为“经济计算问题”）。

会公众以投票为媒介进行的公共选择，重新发现了博尔达（Borda, 1733 ~ 1799）、孔多塞（Condorcet, 1743 ~ 1794）和拉普拉斯（Laplace, 1749 ~ 1827）当年研究成果非同寻常的价值。邓肯·布莱克首次将福利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引入对政治行为的分析之中。随后，K. J. 阿罗（Kenneth J. Arrow）、J. M. 布坎南（James McGill Buchanan）和 G. 塔洛克（G. Tullock）等人在有关非市场决策问题方面的开创性研究，在经济学与政治学、社会学交叉范畴的新学科——“公共选择”理论呱呱坠地，可以认为公共选择理论确立于 1940 年代末，其基本原理和理论框架则是在 1950 ~ 1960 年代得到系统化。

正如布坎南的学生康格莱顿^①（Roger D. Congleton）2002 年所做的介绍（Roger D. Congleton, 2002）^②：公共选择研究大约经历了 50 年的风雨。对它研究的起源：邓肯·布莱克（Duncan Black, 1948）对中间投票人“路径断裂”的研究；布坎南（James McGill Buchanan, 1949）创立的政府财政理论；继而，肯尼斯·J. 阿罗（Kenneth J. Arrow）在整个 1950 年代的富有创新性的研究；布坎南（James McGill Buchanan, 1960）、塔洛克（G. Tullock, 1962）、奥尔森（Mancur Olson, 1965）以及当时在经济学、政治经济学杂志上发表的许多论文。

1972 年肯尼斯·J. 阿罗获诺贝尔经济学奖；1986 年，布坎南以其在公共选择理论方面的突出贡献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1998 年阿马蒂亚·森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标志着这一学科的成熟与繁盛。

^① 康格莱顿：美国乔治·梅森大学（George Mason University, USA）公共选择研究中心（Center for Study of Public Choice, GMU, USA）前任主任，现任该校经济学系教授。

^② Roger D. Congleton, “The Future of Public Choice” [R], 第 6 届国际公共选择研究大会（日本，2002 年 7 月 21 日）论文。

四、艰辛曲折的发展历程

公共选择理论在美国发育的 1940 年代末 ~ 1950 年代初，正是凯恩斯学派垄断美国经济学界的时期，而公共选择理论有着“反凯恩斯主义”的基因，使得它长期受到冷落和排挤。1957 年布坎南 (James McGill Buchanan) 与一批公共选择理论的追随者 [包括：沃伦·纳特 (G. Warren Nutter)、塔洛克 (G. Tullock)、邓肯·布莱克 (Duncan Black)、哈耶克 (F. A. Hayek, 1899 ~ 1992)、罗纳德·科斯 (Ronald H. Coase) 等人] 在弗吉尼亚大学建立公共选择研究的第一个根据地。1963 年，弗吉尼亚大学的校方判定该中心持有“19 世纪极端保守主义的僵硬的观点”，此后布坎南、塔洛克、科斯、沃伦·纳特等人相继被迫离开弗吉尼亚大学。1969 年，布坎南、塔洛克寻求到弗吉尼亚科技学院的支持，在那里创办公共选择研究中心，学术影响逐渐建立起来，当时的这个中心成了公共选择研究的“国际避难所”。但由于公共选择理论与正统经济学派的观点冲突，1982 年，弗吉尼亚科技学院最终无法再容忍该中心的继续存在，该中心被强制关闭。1983 年，公共选择研究中心再次搬家，迁徙到了乔治·梅森大学（曾是弗吉尼亚大学的附属学院，1954 年独立出来，是美国近十年来迅速崛起的一所主要大学）。直到今天，乔治·梅森大学成为国际公共选择研究的大本营。

第二节 公共选择的理论焦点

公共选择理论至今仍存在着一些争辩，这些争辩主要集中于如下几个焦点。

一、效用的衡量准则

公共选择理论的核心内容之一，是对社会福祉函数的研究。对社会福祉函数的研究在相当程度上吸取了（旧）福利经济学到新福利经济学的成果。

旧福利经济学有三个核心假设，第一，个人福利可以采用基数的形式进行衡量；第二，不同人的福利可以加总，并得到社会总福利；第三，补偿检验。在通常情况下，一些政策会使一些人的福利改善，另一些人的福利恶化。英国经济学家卡尔多、希克斯等人提出的补偿检验认为，如果受益者在充分补偿受损者以后，还能够有所剩余，那么这种政策就是符合公共利益的。这实质上就是社会总福利的增加。

1930 年代以后，罗宾斯、萨缪尔森、希克斯等为代表的新福利经济学家强势崛起，特别以罗宾斯的名著《经济科学的性质与意义》为标志，对旧福利经济学的理论基础——基数效用和人际比较提出了质疑：他们认为效用作为一种主观感受，无法用具体数值来衡量，更不能进行人际比较。

总之，新福利经济学主张把福利经济学建立在边际效用序数论的基础之上，而不是建立在边际效用基数论的基础之上。

二、社会福祉函数

公共选择理论界对社会福利函数争辩的焦点在于社会福利函数是否存在，特别是 1950 年肯尼斯·阿罗提出著名的“不可能定理”以来，许多人认为社会福利函数已被宣判了死刑。笔者认为，这种观点是表面化的，如果我们反复阅读公共选择理论大师的著作，我

们可以发现其中新的蕴意。

阿罗“不可能定理”横空出世，指出符合阿罗条件的社会福利函数之不可能性，对于这个结果，公共选择理论研究的几位大师，并未采取绝对化的观点。我们先看看阿罗本人的观点，阿罗《社会选择：个性与多准则》“3.6 效用和”中说^①：“在 2.1 节中我们已经拒绝了将效用和量化的想法，尤其是拒绝个人间效用的比较，现在所采用的方法也就排除了这种福利函数形式。但是，假定效用和仅仅依赖于个人排序而不是效用指标，它还是可以重新形成的。伯格森关于社会福利函数的讨论中似乎已隐含了此意。”

丹尼斯·缪勒（Dennis C. Mueller, 1989/1999）对理论界所研究的社会福利函数做了经典的归纳，将业已提出的社会福利函数概括为四种基本类型^②：“（1）实值的社会福利函数，以伯格森—萨缪尔森的社会福利函数（bergson-samuelson social welfare function）为代表，该理论认为，社会福利值 w （用序数表示）取决于被认为影响福利的所有可能的实值变量 z_i ，即 $w = w(z_1, z_2, \dots)$ 。但这仅是一个概念化的函数，没有给出函数的具体形式。（2）公理性社会福利函数，以威廉·维克里等为代表；（3）社会契约型，以约翰·罗尔斯等人为代表；（4）功利主义契约型。以豪尔绍尼等人为代表。”丹尼斯·缪勒通过旁征博引，对若干有代表性的实值型社会福利函数优、缺点做了较详细的剖析。

当今公共选择理论的另一位代表人物阿马蒂亚·森（Amartya K. Sen）概括了“不可能性定理”的一个新突破口^③：1940 年代以

① [美] 肯尼斯·阿罗著：《社会选择：个性与多准则》，钱晓敏、孟岳良译，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2000 年版。

② [美] 丹尼斯·缪勒著：《公共选择理论》，杨春学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9 年版。

③ SEN, Amartya K. (1970), Collective Choice and Social Welfare [J], Amsterdam: North-Holland.

来，偏好或者其相应的保序函数——效用函数——作为解释个人选择行为的基础已经逐渐成为经济学家的共识。

丹尼斯·缪勒对社会福利函数的前景给出高度凝练的总结^①：“……，如果在这种直觉层次上存在意见一致，那么，拓展我们的共同知觉知识，为设计出一个拟定获得一致赞同的一种宪法的过程，就应该是可能的。如果这种过程的设计获得成功，公共选择就具备我们可以选取的投票规则种类以及就它们的规范性而言提供具体建议的条件。”丹尼斯·缪勒在《公共选择理论》最后一页（第 566 页）最后一个自然段更旗帜鲜明地表态：“公共选择会给我们提供这种知识，我仍然抱着乐观主义的态度……”。

上述大师以对社会福利函数研究的科学态度激励着一些后来者对社会福利函数孜孜不倦地探讨。

三、投票规则——多数同意抑或一致同意

在投票规则设计上，长期以来存在着多数规则与一致同意规则的争论。1956 年，美国政治学家达尔（R. Dahl）对多数原则产生怀疑的原因在于^②“多数原则是按人头论多少，于是它把不平等的强度平等化了。因此多数原则是建立在一种虚构上，即十分软弱和不现实的约定上：让我们假设各种选择的强度是一样的。”规则不能反映投票人的偏好强度，投票的结果不能达到最优。

尽管多数法则遭受了许多的责难，但一方面，它有着悠久的历史习惯；另一方面，作为公共选择的一种具体方法，人们对它积淀

^① [美] 丹尼斯·缪勒著：《公共选择理论》，杨春学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536 页。

^② R. Dahl, A Preface to Democracy [M]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Press, 1956, p. 67.

了可观的研究成果。其中一系列研究成果揭示，多数方法在社会福利函数研究中有着重要的地位：

阿马蒂亚·森在《集体选择与社会福利》第5章（5*1节，P74~77）介绍“关于多数规则的条件”；以及第10章，“多数选择与相关系统”坚持认为多数规则（虽存在着一些重要缺陷）在公共选择中具有重要地位^①“在所有的集体选择规则中，多数决定方法可能比其他任何方法都得到更多研究，……容易理解它具有广泛的吸引力”。并在该书第5章第6节“关于选择规则的条件”中对多数规则予以理论上的高度概括^②：“梅（May, 1952）证明了，唯一确定的具有无限制定义域的、无关方案独立的、同时具匿名性、中立性、中立性和正响应性的CCR是多数方法。若一个人赞成所有这些条件而不愿意接受多数规则，那么他就麻烦了，因为他至少必须要丢弃这些判断中的一个。……多数决定方法像帕累托扩展规则那样，满足独立性、匿名性、中立性、非负响应性、强帕累托原则，以及无限制定义域条件。”

另一方面，我们再看看其他学者对一致同意规则的讨论：1896年，瑞典学者克努特·威克塞尔（John Gustav Knut Wicksell）从独特的视角提议：^③“把所有人从集体行动中受益的可能性与全体一致性通过规则联系起来”、提出“一致性规则是唯一能确定地导出满足帕累托条件的公共物品数量和税额的选举规则”。

1962年布坎南（James M. Buchanan）与戈登·塔洛克（Gorden Tullock）在其名著《一致同意的计算》中论证了在公共选择中，由

① [印] 阿马蒂亚·森著：《集体选择与社会福利》，胡的的、胡毓达译，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4年版，第170~172页。

② 笔者注：指“集体选择规则”。

③ [美] 丹尼斯·缪勒著、杨春学译：《公共选择理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63~64页。

于信息不对称，一致同意需要极大的成本。现实中的政治程序多采取间接民主制（代议制）或多数票原则（简单多数或比例多数）。但政府行为和政府目标很大程度上受政治家和政治官员的动机支配……但多数原则是否就必然提供了合理性呢？或者多数人是否有剥夺少数人权力和自由的正义呢？这显然是个争论更深层次的一个问题^①。与阿罗的观点相同，布坎南认为在相互冲突的主体间形成一致的规则是不可能的，因此只能求其次，通过多数人规则来实现，这就必须理解多数人规则的实质：并不在于让多数人接受而形成决策的规则，而在于让所有人都接受决策的规则。布坎南认为多数主义政治会导致多数人联合体利用政府权力为自己的利益而重新分配资源，对经济和社会产生负面效应。他主张放弃简单多数规则，而建立一个可以包容更多人的规则，即一种“普遍性的限制”（constraint for generality）从而使政治家在决策时按照公众的利益公平的处理社会福利的分配^②。

1971年戈登·塔洛克（1971）认为^③，在现实世界中，投票者的个数总是大大超过备选方案个数。这时，出现投票悖论的概率是如此之小，以至于实际上可以不考虑它。这时，出现一致的概率就很高，而再提出或拥护另一个选择方案的成本会高于该方案能带来的利益。如果实际的多数投票结果确实靠近中间状态，则该结果将被大家所接受。

1994年，休·史卓顿（Hugh Stretton）和奥查德（Lionel Orchard）的分析表明：由于投票过程中理想最优的一致同意的

① 詹姆斯·布坎南、戈登·塔洛克：《同意的计算》，陈光金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24页。

② Buchanan, J. M. & Tullock, G (1962), *The Calculus of Consent* [M],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p96.

③ Gordon Tullock, *Public Decisions as Public Goods* [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79 July/August 1971.

直接民主无法实施，实际中采取的间接民主投票仍不是理想的民主决策方式。间接民主投票存在如下缺陷^①：（1）多数票规则难以获得均衡结果；（2）多数票规则会导致对公共决策控制权的争夺；（3）多数票规则会导致选民对公共选择活动的冷淡。可见，现代公共选择仍处在左右为难的境地中。

尽管存在如此激烈的争辩，在一些特定场合的实践中，如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会议进行表决和欧洲联盟对财政预算议案、修改有关欧洲中央银行体制的协议进行表决时都使用一致同意规则。根据这个规则做出的集体决定，可以满足所有投票人的偏好；如果一项决策使其中任何一个人利益受到损害，它便不能获得通过。

第三节 我国学者的研究

无疑，公共选择理论研究的中心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但我国学者亦积极投身于公共选择理论的研究。就目前我国学者对公共选择研究的成果看，可以分为如下几类：

一、将公共选择理论介绍、引入我国

在这方面，1974年，我国台湾学者汤慎之完成出版了译著《社会选择及个人价值》（〔美〕肯尼斯·阿罗著，汤慎之译，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编印，1974）；

1989年，杨永超出版了译著《公共选择》（〔日〕小林良彰

^① Hugh Stretton, Lionel Orchard, Public Goods, Public Enterprise in Public Choice [M], ST. Marth's Press, INC, 1994, p177.